

中國文哲

研究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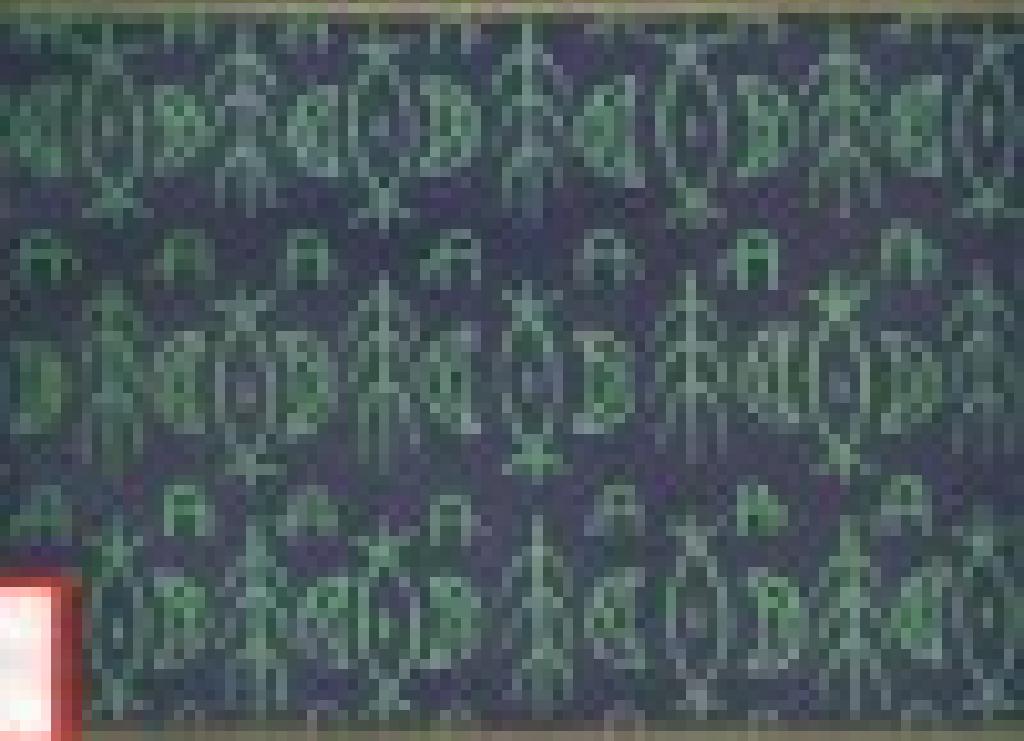


(319)

4

中國人水

研究批判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第四辑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第四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413 千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1987 年 1 月第一版 198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1253·020 定价：3.10 元

《中国文化》顾问和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于光远 刘大年 李 新 周谷城 胡 绳
顾廷龙 梅 益 黎 浏 谭其骧 蔡尚思

编委：

丁守和(主编) 方 行(主编) 王学庄
刘志琴 朱维铮 汤 纲 李华兴 耿云志
姜义华 黄 沫

目 录

- 明堂形制初探 王世仁 (1)
 制度渊源 西汉明堂辟雍 东汉明堂 灵台
 南北朝、隋唐明堂 宋、明、清明堂辟雍 余论
- 先秦礼论初探 刘泽华 (44)
“天下为官”考释 董楚平 (62)
谈“逻各斯”和《老子》中的“道” [加拿大] 黄承安 (65)
《想尔注》怎样解《老子》为宗教神学 谢祥荣 (71)
论清末的教育改革思想 赵金钰 (93)
论康谭哲学思想的同异 邱柏林 (117)
 ——兼论康谭哲学的历史地位
注重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背景 周勤 (143)
- 东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 卢云 (155)
元代西域人的华化与儒学 杨志玖 (188)
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墨 陈维 (204)
- 秦汉杂技艺术初探 韩养民 (220)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考析 谭继和 (240)
- 从戊戌期间的张元济看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
..... [新西兰] 叶宋曼瑛 (261)

- 沈毓桂与林乐知 于醒民 (273)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实录 王晓秋 (301)

·书评·

- 中国古代文化中艺术精神的探源潮流
——读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卢善庆 (311)

·资料·

- 开智录(上) 陈匡时整理校点 (326)
改良第一期目录 (328)
改良第二期目录 (357)
改良第三期目录 (387)

·文摘·

- 把文化史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
..... [苏] B. T. 叶尔马科夫原著 董进泉摘译 (416)
扬州常州学派及其江南文化圈
..... [日] 大谷敏夫著 毛丹青节译 (424)
“江河文明”史观之提倡
..... [日] 伊藤道治著 姚 平摘译 (435)
殷周时期的南方文化 [日] 白川静著 姚 平编译 (437)
《中国文化》稿约 (441)
《中国文化》第五辑要目 (442)

* 本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执行编辑 *

TABLE OF CONTENT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 of the 'Imperial Ceremonial Hall'	Wang Shiren
Origin of the Institution	
West Han Dynasty's Imperial Ceremonial Hall and Sacrificial Hall	
East Han Dynasty's Imperial Ceremonial Hall and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The Imperial Ceremonial Hall of the Southern, Norther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Imperial Ceremonial Hall and Sacrificial Hall of the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rther Remark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Early Qin Dynasty's Rites	Liu Zehua
A Textu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Government Belonging to the Entire People'	Dong Chuping
How Xiang 'erzhu Interpreted Laozi's Theology.....	Xie Xiangrong

- Theories on Educational Reform in Late
Qing Dynasty Zhao Jinjue
-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Kang Youwei's
and Tan Sitong's Philosophies Kuang Bolin
-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Study of Ideology
History Zhou Qin
- Cultural Districts and Cultural Centres in the
East Han Period Lu Yun
- China's Western Tribesmen's Adoption of
Han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Yuan
Dynasty Yang Zhijiu
- In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Chen Wei
- Acrobatic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Han Yangmin
- An Analysis of 'Zhu Geliang's Fond of
Chanting to the Tune of *Liangfu*' Tan Jihe
- Shen Yuegui and Lin Lezhi Yu Xingmin
-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in
Modern Times Wang Xiaoqiu

Book Review

- Tracing the Artistic Spirit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fter Reading the Taiwan Scholar
Xu Fuguan's *Chinese Artistic Spirit* Lu Shanqing

Data

Enlightenment Journal (Part I) Arranged, checked
and punctuated by Chen Kuangshi

Reform (1st Issue)

Reform (2nd Issue)

Reform (3rd Issue)



明 堂 形 制 初 探

王 世 仁

建筑是有实用功能的物质产品。人们创造建筑，当然首先是为了要住得舒适。但是，中国建筑史的实例说明，人们花费在非实用的建筑或建筑的非实用方面的力量，却大大超过了生活实用的建筑或建筑的实用方面。《礼记·曲礼》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这里的宗庙只是一个代表，宫殿的大部分，祭祀建筑，宗教建筑等等，即服务于精神方面的一切非生活实用的建筑都属于优先营建的范围。这样，建筑的审美功能便显著地被突出了。中国古代建筑在建设奴隶制、封建制社会的精神文明方面，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建筑的审美功能，又不仅仅在于取得观感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要起到助人伦，敦教化，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统治权威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始终贯穿着实践的理性精神，使建筑艺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政治性和伦理性。因此，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形象创作中，就特别重视它的社会内容，它的象征涵义和这些内容、涵义的表达力量。这一美学特征，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体现在一切建筑中，明堂则是最典型的代表。

制度渊源(附图1)

明堂制度，是儒家聚讼千载的一个重要课题，常常是由帝王亲自主持，动员了最权威的学者进行议论考证，但又往往不得要领。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渊源久远，涵义众多。

最早记述明堂制度的文献是《考工记》。该书据郭沫若考证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官书^①。设计明堂是“攻木之工”中“匠人”的职责。书中只讲明堂的建筑形式和尺度，没有涉及任何涵义。大体上相当或略晚于《考工记》的《礼记》中某些篇章，则对明堂的功能和涵义有了明确的记述：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太庙，天子明堂。(《明堂位》)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祭义》)

明堂之制，周施以水，水行左施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玉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明堂阴阳录》，据《太平御览》引)

《大戴礼记》也说：“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回辟雍”。

这几条记述说明，春秋战国及这以前，明堂是天子召见诸侯颁布政令，并兼祭祀祖宗的场所，是一座礼仪兼祭祀的建筑，建筑形式有所象征。

首先要对《考工记》的明堂形式和尺度的文字作出明确的解释。文字不多，照录如下：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① 《十批判书·古代社会研究的自我批判》。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

文字过于简约，且有脱衍。例如殷人重屋有修（南北进深）而无广（东西面阔）；周人明堂无阶；夏后氏世室无堂崇（高度）。又殷周皆不言建筑色彩，独夏后氏世室有“白盛”，郑玄注是“以蜃灰垩墙，所以饰成宫室”，实在太勉强，恐怕是衍文。又“四旁两夹窗白盛”，历来均断为“四旁两夹窗。白盛”，也嫌牵强，今断为“四旁。两夹。”方可与上文“九阶”呼应；如是，则“窗”后面应是别的说明窗的形制的文字，方可与后文“门，堂三之二……”呼应。要之，从汉至清，不少学者对这些文字进行考据猜测，设想了不少方案，也提出了不少问题。比较趋于一致的方案是，主体建筑是一个十字轴对称的大房子，内部呈“井”字形分隔。提出的问题则以隋代宇文恺的《明堂议表》最为关键：

三王之世，夏为最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室？相形为论，理恐不尔。（《隋书·宇文恺传》）

殷人重屋，南北（修）七寻，一寻八尺，共五十六尺；周人明堂，南北七筵，一筵九尺，共六十三尺；而夏后氏世室南北十四步（二七），一步六尺，共八十四尺，按照建筑由简趋繁，由狭趋宽的规律，确实不合理。于是宇文恺说，“二七”中的“二”是“增益记文”，是“桑间俗儒，信情加减”。据他说他见到的古本“并无‘二’字”，所以堂修二七乃是“堂修七”，七步四十二尺，三代中夏最早，尺度也最小，合乎情理。今按，宇文恺是杰出的建筑大师，他从建筑发展的趋势认为夏小于殷，殷小于周，这是正确的，但他说曾见到过“古书”则颇可疑。试问，从东汉以来，注经（包括《考工记》）儒生何止数十家，都不曾提到还有什么“古书”秘本，何得乃至隋代才突然出现？事实是他们都错误地相信了夏朝确实有过一个《考工记》所描述那样的世室——明堂。须知，夏朝文化至今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夏朝建筑更是茫然得很。据考古资料，商朝的高级建筑，如偃师二里

头遗址^①，黄陂盘龙城遗址^②，安阳小屯殷墟遗址^③，都是基座高不超过1米，进深大约10~13米左右的矩形房屋，大体上都符合《考工记》殷人重屋的尺度。周人明堂尺度略大于殷人重屋，完全可能是对实际遗物的描述；而所谓夏后氏世室，尺度最大，形制最完整，叙述最详细，说明它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一个理想方案，或者说是《考工记》作者的设计图，托名夏朝，不过是托古而言今。据此，可将这三种明堂的形式推测如下。

一、殷人重屋。只言进深(修)而不言面阔，就不应将周、“夏”制度硬套上去而设想成十字轴线对称的正方形形式。据上述三座商代高级建筑基址推断，重屋很可能也是一座矩形房屋。按商尺一尺等于0.169米计算，进深56尺约合9.5米，台高3尺约合50厘米。今选用二里头遗址的平面比例和柱网关系，可分隔成为一个扁长的“井”字形格局。中间“太室”依靠天窗采光通风，突出一个屋顶，是为“重屋”。

二、周人明堂。是由矩形房屋向正方形台榭过渡的中间形式。土台南北进深九筵共81尺，东西面阔七筵共63尺，台高一筵四尺。台上五室，每室长宽均二筵18尺。历来的解释大都将五室放于台(堂)上。但日人田中俊将中心太室放在堂上，其余四室放在堂下四侧^④则是一新解。今按，堂高九尺不过1.7米左右，势不可能安排房屋，故此解释尚可推敲。台上置五室，每室每面18尺，台四周各留半筵即4.5尺。这个尺寸是为了保证台上的室柱有足够的承压角度，即后世称为“下出”的部位。东西(面阔)方向太室两侧各留一筵即9尺的通道。这两条通道一是五室间交通所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② 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③ 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载《小屯》第一本。

④ 《先秦时代宫室建筑序说》，《东方学报》第五十二册。

需；二是屋檐排水所需；三是据周代建筑通例，设左右阶的位置所需。

三、所谓夏后氏世室。应是一座标准的台榭建筑，中心、四隅为土台，四面两层，十字轴线对称。下层为堂，上层为室。“堂修二七”，指下层每面有二堂，各修七步，二堂即二七；“广四修一”，指面阔（广）是进深（修）的四倍。从一个方向来说，有两个堂的修14步，再加一个堂的广14步，共28步，即一堂之修的四倍。但堂的面阔中有一部分由于土台结构和“夹”的位置，两边又各占去1步，所以堂的面阔实际为12步，三间，每间4步，是为“三四步”。上层太室与下面的堂间架尺寸相对应，每面三间，每间4步，也是“三四步”。四旁，指台上太室四面的敞坪，亦即下屋堂的平屋顶，按旁通侧，通外，所以应是一种建筑的具体部位。两夹，应指在东西两堂的后面各有一夹室，其宽度为1步。此种夹室的做法，以后尚见于西汉长安明堂辟雍和东汉洛阳灵台（只有一夹），可能是储放神主的密室，也可能是在内部升台的楼梯。四隅土台上建四室，每室各留“下出”三尺，是为“四三尺”。东、西、北各二阶，南面三阶，是为“九阶”。下层堂每堂二门一窗，上层室每室每面一门二窗，是为“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自盛”实不明白是何意思。

这种十字轴线对称，“井”字形分隔，相邻为九，间隔为五的空间模式，由于它的形式美的特征，便附会出了许多礼制祠祀的内容。蔡邕《明堂月令论》说：“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环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实，其实一也”。这个模式所容纳的涵义，包括它的美学涵义，则是极为广泛而神圣的。《白虎通》说：“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教，显有能，褒有行者也”。五室对称，正向四堂，堂分庙、个，于是明堂之中可以包含四向、四庙、四堂、四学，五方、五帝、五神、五德、五材、五色、五音、五味、五臭、五虫、五脏、五谷、五肉，

以及十二月、十二律、十二居所等等^①。总之，它已经成了天上地下，宇宙万物，和谐折衷，运行不息的象征了。

然而何以命名为“明”堂，还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明”的涵义是“明政教”（《考工记》郑注）、“明诸侯尊卑”（《大戴礼记》），明堂是明辨方位，明辨政事，明辨时序，明辨等级的场所，含有伦理的、时间的意义。另一种“明”的涵义是“取其向明”（《明堂月令论》），“垣高无蔽日之照”（《黄图》），明堂是周围通透，四向八达，外向对称，明朗敞开的建筑物，含有审美的、空间的意义。这种时空交汇的审美观念，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建筑观念里，已经有了萌芽。明堂形制的渊源，也应当肇始于那时。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这段描述是合乎实际的。当原始社会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时期以后，人们必然能够从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五谷蕃植与不同方向风雨和不同季节月日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起初对于这些自然现象只能从神学的意义上加以认识，直到商代还要不时对东、南、西、北方向的风和雨进行占卜；但是人们终于还是从现实中认识了方位，认识了时序，认识了运动，认识了和谐。为了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要对不同月份，不同季节，不同方向，不同神灵进行祈祷祭祀。祭祀要有一定的场所，如果这个场所的形式和祭祀的内容有着某种对应的关联，那么它赋予祭祀仪式的气氛就会更加浓厚。按照上述农业生产的需求，对称的方位，匀称的比例，明确的次序是对这个场所最主要的要求。而黄河流域的一些半地穴的建筑形式正好给这种要求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关于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建筑，现在已经发掘出了大量遗址，其中西安半坡村，临潼姜寨和陕县庙底沟的材料很有典型

^① 参看《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月纪》。

性。半坡村 F₂₂ 圆形住所，中部有四根对称的柱子；姜寨 F₁₄ 方形住所，则在方形中部有接近圆形的一圈柱子；庙底沟 F₃₀₂ 方形住所和半坡村 F₁ 方形“大房子”，是在中部有四根对称的柱子^①。这几处建筑的内部柱子连线，都可以分隔成“井”字形的构图，特别是半坡村 F₁ “大房子”，面积达 175 平方米左右，内柱直径约 45 厘米，可以设想整个空间的尺度相当巨大。它不可能是住所，因为当时早已脱离了群婚而对偶婚的住所又不需要如此之大。它位于整个居住区的中部，很可能是公共集会的会堂，而原始氏族公社公共集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祭祀——祭天、祭神和祭祖。值得注意的是，这所“大房子”的方位正好是正向的南北向，它已经具备了上述祭祀要求的两大要素——方位和次序了。

艺术起源于实用，审美观念起源于劳动实践。当人们在创造不大的居室空间时，基于他们对长期曾经居住过的洞穴、巢居、窝棚的生活实践，首先认识到圆形空间最经济，结构最安全（穹顶、圆壁、树枝弯拱），屋顶构造最简单，所以大量建造圆形居所，圆也是最美的形象。但是当须要进一步扩大空间时，圆形屋顶的结构就要复杂得多，而做为同等尺度的空间来说，圆形的利用率也要随之下降；同时现实生活中日益明晰的方位、次序观念，也要求人们从矩形建筑中寻求突破。但矩形又不如方形经济，所以方形建筑又大量被采用，方也成了最美的形象。两者也可以交叉结合，方中套圆或圆中套方，此后明堂所谓上圆下方的概念，或许也多少和原始人的住所房屋形式有关吧。要之，原始社会末期的大房子，有明确的方位和次序关系，能满足祭祀的要求，又符合人们审美实践的发展道路，它应当就是明堂的最早形式。当然，从这种“井”字形构图，十字轴线对称的“大房子”，到《考工记》描述的周人明堂，中间也必然经过对其它构图形式的探索。夏代、商代完全可能探索过

^① 这里所谓方形、圆形，均指大体上的形状，不是绝对的正方形正圆形。在原始社会没有直尺圆规，不可能做出正方形正圆形来。